
叙述的传播符号学

声音与权威：叙述交流模式探析*

方小莉

摘要：叙述文本的创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具有权威性。话语权威在相互作用中形成，它的实现依靠说者与观众的相互交流，是对话双方叙述与阐释的结果。本文以叙述交流为关键词，主要以亚文化群体的叙述文本为例来探讨文本中各要素之间的叙述交流模式在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变化发展。不同叙述交流模式各具特点，本文尝试将各种不同的叙述交流方式归纳为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它们是叙述交流双方在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下共同选择的结果。叙述的有效性就在于创作者既不脱离各自所处时代和环境中的叙事常规和社会习俗，又能灵活采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和技巧来积极参与社会话语权威建构并获得读者的支持。

关键词：叙述交流 作者型叙述交流模式 个人型叙述交流模式
集体型叙述交流模式

DOI:10.13760/b.cnki.csalt.2017.0025

叙述文本的创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具有权威性，都想在一定范围内对那些被作品争取过来的读者群体产生权威。话语权威在相互作用中形成，它的实现依靠说者与观众的相互交流，是对话双方叙述与阐释的产物。作者要通过文本意义的生产来实现自己的话语权威，那么与文本相关的各因素（作家、叙述者、人物等）就必须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奇幻文学的叙述类型研究”（16CWW030）阶段性成果。

要获得一定的知识名誉、意识形态地位,作品的美学价值也不可忽视。^①也就是说,在小说的意义生产中,说者必须要具有智力上的可信度,生产出的文本意义要实现其意识形态有效性,而作为文学作品,其审美价值也不可忽略。这三点的实现,离不开话语接受群体的参与。判定说者是否值得信任,文本的意义是否产生影响,以及文学作品是否具有美学价值,都离不开话语接受群体的阐释。因此作者对叙述策略的选择,叙述者表述自己的方式,作者与读者之间、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建立的联系,以及双方的意识形态和情感方面的立场,都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文本意义的产生和话语权威的实现。

赵毅衡在《广义叙述学》中重新把叙述定义为两个叙述化过程:

1. 某个主体把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
2. 此文本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②

从构成叙述的两个叙述化过程可以看出,叙述文本不是单方面发送信息,文本意义的产生是一个双向的交流过程。^③那么在叙述文本中,其意义的阐释则要考察文本中的各个声音主体如何进行交流,并在彼此交流中生产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意义,从而建构自己声音的权威。

交流使信息、价值观等得以相互传递,从而产生新的意义。从修辞的角度来讲,“叙事是指某人在特定场合出于特定目的向某人讲述某事的发生”^④。申丹认为每一种叙事都涉及交流。叙事交流是叙事作品得以产生的基本途径。交流行为的根本目的在于向读者传递故事及其意义。^⑤从两位专家的观点来看,叙述交流涉及以下几个因素:交流的主体,即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某人);语境(特定场合);意义生产(特定目的);信息(某事)。因此对于小说文本来讲,小说作者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试图向读者讲述某个故事,希望在与读者的交流中实现其生产意义的目的,并希望读者能够阐释出自己的意义,使自己的意义合法化、自然化。而在小说文本内,故事的叙述者也出于同样的目的而在特定的环境中对受述者讲述某一个故事,从而在交流中实现其意义。本文所说的意义生产并非是指单方面由信息发送者将文

① 参考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②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页。

③ 文一茗:《不可靠叙述的研究》,见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第3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2—71页。

④ 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2页。

⑤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8—86页。

本意义传送给接受者，而是指文本的说者与听者作为平等的对话主体共同生产文本的意义。在小说中，一个叙事包含两个叙述化过程：信息发送者的叙述和信息接受者的叙述。在编码与解码的过程中，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相互对话，相互协商，甚至是相互斗争，从而让文本的意义得以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文本中的意义生产离不开作者、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相互作用。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下，作者对文本的编码以及读者对文本的解码都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化。文本、作者、读者都受到具体社会历史语境的影响。同时，文本内部的叙述者、受述者、人物、隐含作者以及隐含读者各要素之间通过相互交流，在合作、对话、斗争中合力生产出文本的意义，即文本的隐含作者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小说的意义生产，隐含作者的价值取向，必须要关注文本内外各要素——作者、读者、叙述者、受述者、人物、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以叙述交流为关键词，主要以亚文化群体的叙述文本为例，探讨文本中各要素之间的叙述交流模式在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变化发展。

一、作者型叙述交流模式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之前的小说主要采用全知全能叙述。这种叙述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者，同时叙述者又可以无限制地进入任何人物的心理。由于在西方长期以来叙述的权威大都属于受过教育的白人男性，因此全知全能叙述中的叙述者虽然更多地显示为框架，但读者还是更倾向于将叙述者等同于男性。同时由于这种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不是文本中的人物，但又了解一切细节，所以读者容易将叙述者等同于创作者。在这里，笔者参照兰瑟的术语，将这类叙述交流模式称为作者型叙述交流模式。作者型叙述交流模式主要由以下因素构成：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受述者、隐含读者、读者。在这个模式中，叙述者没有被人格化，所以读者易于将叙述者与作者画上等号，而同时也易于将自己与受述者画上等号。从结构上看，叙述者似乎等同于作者，因此当叙述者成为权威时，作者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了权威。

在作者型叙述交流模式中，叙述者由第三人称显示，因此其身份特点没有被标出。当然，由于亚文化群体长期被排除在社会话语权力之外，故社会上作者的声音权威长期以来都属于主流文化中的男性，这已成惯例。^① 由此，

^① 参考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20页。

读者易于将叙述者等同于男性。若是男性作家创作的作品,其中的第三人称叙述者自然被认为是男性。兰瑟也曾提到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当叙述者的性别、种族等特征没有标出时,这个叙述者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因此在作者型叙述交流模式中,亚文化群体小说家可以通过这种模糊身份的叙述模式来参与主流文化的建构,通过对主流社会文化权威模式的挪用来“偷偷”建构自己的声音权威。

从话语接受群体来看,这个叙述交流模式能否实现声音的权威,首先要看读者是否愿意将自己置于受述者的位置,愿意倾听这个故事;当然,更重要的是看叙述者能否争取到这些愿意倾听他/她故事的读者的积极配合,完成小说的二次叙述,从而成功生产出有利于隐含作者的文本意义,赢得更多的理想读者。叙述交流模式的选择受到不同语境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只有选择正确的叙述交流模式,才能赢得读者的交流合作,才能实现文本的意义。

以黑人女性小说家的文本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限制,黑人女性读者群的构成非常有限。在这个时期,一方面,黑人女性不得不迎合主导的社会权力,以保证自己的作品能够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另外一方面,黑人女性又必须对权威机构和主流意识形态持有批判态度,这样才能生产出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文本意义,以获得更多的理想读者。黑人女性只有同时争取到这些读者,才能够实现自己声音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作者把自己表述为女性叙述者,那么她有可能遭到明确的拒斥。因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在人们的阅读期待中,甚至只有受过教育的白人男性才具有智力上的可靠性,只有白人男性的作品才具有美学价值。这样一来,无论是男性读者,还是那些几乎不存在的黑人女性读者以及不明身份的读者,均有可能拒绝将自己置于受述者的位置,拒绝视这个性别标出的女性声音为真实可靠。因此在这个时期,黑人女性普遍采取这种模糊性别的叙述模式来讲述女性的故事。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小说都采用了全知的叙事视角。虽然声音与眼光分别指称叙述者和视角,但是在具体的分析中,却很难将声音和视角问题分开来考虑。读者愿意倾听这个无性别的叙述者讲述故事,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些读者能否认同叙述者。如果叙述者总是从同一个人物的视角来讲述故事,那么不同身份的读者就无法从小说中找到自我认同。黑人女性小说家主要讲述女性的故事,黑人女性通常为主要人物。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复杂的读者群很难产生与黑人女性在身份、认识及情感上的认同。全知全能的作者型叙述者则不同,她掌控叙述中的所有信息,不局限于任何一个人物的视角,这样,读

者在阅读时也不用局限于任何一个人物的视角，因而获得了像全知全能的叙述者那样掌控全局的优越感，更容易接受小说的隐含作者想要传递的信息。黑人女性小说中的叙述者若没有明确的女性标记，就可能赢得更为有效的公众权威，争取到各种读者。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黑人文学史上，无论是初露头角的新手，还是略有名气的黑人女作家，几乎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这种叙述策略。

二、个人型叙述交流模式

在个人型叙述交流模式中，叙述者采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或者是戏剧化的故事中的角色。在这种叙述交流模式中，叙述者的身份被直接或间接地标出。

在第一种情况，即叙述者采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时，虽然表面看来叙述者为框架，身份并没有被标出，但是由于叙述者选择从某个特定人物的视角来看世界，只展示某个特定人物的内心，所以读者只能跟随着这个人物的视角来看世界，也只能了解这个特定人物的心理。对于主流男性作家来说，这并不成问题，因为他们是传统权威的掌握者，所以性别标出为男性是自然的。然而对于被边缘化的亚文化群体来说，身份被标出则意味着读者因质疑其权威而作抵制性阅读的风险。

在第二种情况，即叙述者是戏剧化的故事中的角色时，由于叙述者本身是虚构世界的一个实体，因此叙述者与作者在形式上就截然不同。这种叙述形式又分为公开的叙述交流模式和私下的叙述交流模式两种。^①公开的叙述交流模式为：作者—隐含作者—人格化叙述者—人物—受述者—隐含读者—读者。由于叙述者并不是对虚构世界中特定的人物讲述故事，对受述者没有任何的介绍和描述，所以读者比较容易将自己放在受述者的位置上，认为叙述者直接在向自己讲故事。私下叙述的交流模式为：作者—隐含作者—人格化叙述者—人物—人格化受述者—隐含读者—读者。在私下叙述中，叙述者给特定的故事内人物讲述故事。如果叙述者对受述者的姓名、身份等个人信息

^① 兰瑟根据受述者在叙事文本中的结构位置，将叙述划分为“公开叙述”（public narration）和“私下叙述”（private narration）。公开叙述是指此叙述的接受对象存在于文本世界之外，可以等同于公众读者；而私下叙述则指此叙述的接受对象存在于文本之内，是一个显身受述者。兰瑟将公开叙述的叙述者与受述者的关系定义为近似于作者与读者，而私下叙述的叙述者与受述者是文本内虚构世界的故事讲述者与听者（人物）Susan Lanser, “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 *Style* 20, No. 3 (Fall 1986): 341-363.

有所交代,那么读者与受述者之间的距离就相对较远,作为读者,我们更像是在受述者旁边“偷听”。

在个人型叙述交流模式中,叙述者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他/她致力于讲述自己的故事。与采用模糊性别的作者型叙述交流模式不同,个人型叙述者是虚构世界中的某个特定人物,其身份被直接或间接标出。与作者型叙述模式相比,亚文化群体小说创作者选择个人型叙述模式可能面临以下困难:

首先个人型叙述模式中的叙述者由于身份被标出而无法戴上模糊身份的面具或采取所谓超然的“第三人称”,也无法藏匿于所谓的主流权威文类并使用其话语权。^①

其次作者型叙述模式中的叙述者拥有运用知识作出判断的充裕余地,而个人型叙述者由于视角的自限,只拥有解释自己经历的权利及话语效力。^②

再次,由于主流文化的男性作家也建构了亚文化群体的声音,那么在争夺叙述权的竞争中,亚文化群体还需要与主流文化作家展开竞争,以成为合法正统的声音代言人。

最后,个人型叙述里的虚构,特别是第一人称叙述,在形式上往往难以与自传区分,极为有可能被定义为对自我的再现,是直觉的产物,而不是艺术的结晶。^③

以上四点可以说是亚文化群体采用个人型叙述交流模式可能要面临的困境。主流群体的男性作家并没有这些顾忌,因为长期以来话语权都属于男性,他们无论采取作者型叙述还是个人型叙述,都彰显其男性权威。亚文化群体的作家采用作者型叙述交流模式,虽然可以在身份面具下偷偷参与权威建构,但同时也表示对主流权威的肯定与让步。他们采用个人型叙述模式,虽然会面临巨大的困难,但却使得亚文化群体能够站出来反抗主流文化权威,建构自己的声音权威,因为个人型叙述交流模式摘掉了模糊身份的面具,是在用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经历。

同样以黑人女性这个亚文化群体为例。20世纪60年代末起,特别是70年代以来,美国黑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及教育状况随着美国种族政策的改善以及黑人民众的斗争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种族、性别、阶级问题依

① 参考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② 参考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③ 参考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然随处可见，但相比之前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善。再加上女权运动的发展，黑人女作家也渐渐从边缘走到中心，她们的知识权威，她们作品的意识形态有效性以及美学价值逐渐得到肯定。黑人女性的经历不再只是男性世界的点缀，她们的判断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另一种阐释，她们用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得到肯定，这些都促进了她们声音权威的建构。与此同时，黑人女作家的读者群也发生了巨大变化。70年代以来，黑人女性教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美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超过男性，黑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远超黑人男性。这些女性开始愿意通过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去感受、观察并接受她们的世界，仔细聆听她们的故事。这样一来，黑人女性通过创作赢得更多读者的几率大大增加，更有利于实现其声音的权威。

除此之外，个人型叙述交流模式本身也有自己的结构优势。黑人女性小说中个人型叙述交流模式的叙述者性别为女性，使得建构黑人女性声音的权威名正言顺。小说的所有故事都是由这个女性叙述者讲述的，她统筹了所有其他叙述，女性的声音、经历与视角自然成为小说的中心。读者必须通过她的视角来观察这个虚构世界，也必须通过女性经历来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因此这个声音虽然面临很多困境，但是它克服重重困难之后，名正言顺地彰显了黑人女性声音的权威。

三、集体型叙述交流模式

兰瑟认为，“在西方小说中，由于叙事和情节的结构都是个人化的和以男性为中心的，要明确地喊出某种集体女性的声音就不只是一个语篇问题，而是几乎总要涉及故事这一层”^①。可见对主流文化来说，发出集体的声音，从来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他们无论以作者型还是以个人型交流模式来讲述故事，都能代表主流文化群体，都能巩固主流文化本已建构的权威，因此喊出集体的声音从来都不是他们的诉求。然而亚文化群体则不同，由于在主流文化的夹缝中生存，他们很难以“我们”讲出群体的诉求。作为被标出的异项，亚文化群体要想在主流文化内部找到一席之地，同时还要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又必然需要集体的声音。因此集体型的叙述模式更多被亚文化群体，特别是女性亚文化群体采用。

笔者所说的集体型叙述交流模式中叙述者的叙述代表了某一群体的共同

^① 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声音,或者说某一群体中的各种不同声音汇聚成一个群体的故事。这种集体声音的建构与群体的建构是互为表里的。笔者所谓集体是指任何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可以是一个小群体,也可以是整个人类大群体。而群体的声音则是指代表这个群体讲述这个集体故事的单个叙述者的声音,或是这个集体中的不同成员共同讲述故事的声音。因此集体型叙述交流模式主要分为两类。

其一:作者—隐含作者—(人格化或非人格化)叙述者—人物群体—受述者—隐含读者—读者。在这一模式中,叙述者为单数。他/她可以是小说中的人物,也可以是故事外叙述者。小说以某个集体为主角,通过集体中的人物来讲述该集体的故事。在这一模式下,集体中每一个人物的故事都得以讲述,同时同一个叙述者又将每一个个体的故事联合起来汇集成为一个集体的故事。

其二:作者—隐含作者—(人格化)叙述者(复数)—人物群体—受述者—隐含读者—读者。在这一模式中,叙述者是虚构世界的人物。小说以某个集体为主角,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用自己的声音轮流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这一模式下,小说中的叙述者甚至并不局限于这个特定的群体,读者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

集体型叙述交流模式具有作者型叙述交流模式与个人型叙述交流模式不具备的特点。

第一,不同的叙述声音互相协作,共同创立一种具有集体权威的话语实体。^①小说以某个集体为主角,集体中的各个人物发出各自的声音。这些单个的声音汇集成为代表整体的集体声音,从而壮大了群体声音的力量,便于某个集体声音权威的建构。

第二,声音、视角的多样性带来了相对的客观真实,但仍是选择地呈现历史。在个人型叙述交流模式中,读者只能听到叙述者个人的声音,只能通过主人公一个人的视角来观察这个虚构世界。而在集体型叙述交流模式中,读者能听到不同的声音,能通过不同的视角来观察这个虚构世界,可以比较、权衡各种声音,这使得叙述者的叙述显得相对客观真实。与作者型叙述交流模式相比,集体型叙述模式中的叙述者有选择地聚焦于几个主要人物,在保证相对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呈现历史,对读者的阐释更具有诱导性。

第三,在集体型的叙述交流模式中,叙述者和视角的多样化,使得亚文化作家群体一方面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也可以含

^① 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纳主流文化群体的声音。通过集体型叙述交流模式，亚文化作家群体不仅可以诠释自己的声音，也可以诠释主流文化的声音，可以从自己的视角来书写世界，让自己的声音与主流群体的声音竞争并对话，名正言顺地争取群体声音的权威地位。

黑人女性作家群作为最边缘化的集体的代表，自然是集体型叙述交流模式最好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由于里根政府以及老布什政府的保守执政，民权运动的成果遭到破坏，美国的种族矛盾又一次激化，美国对待黑人的政治、经济政策又一次威胁到黑人民众的正当权益。直到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的种族矛盾才有所缓和。同时由于女权运动的发展，妇女追求自由、平等，性别问题也日渐突出。70年代到80年代初黑人女性用自己的笔书写女性个人经历，性属问题成为种族之外的另一个重要主题。随着非裔美国女性文学的繁荣，黑人女性作品获得了肯定。黑人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黑人女性对自己经历的关注与书写都严重威胁到父权制社会中男性的地位。黑人男性逐渐感觉到了性别危机，他们控诉黑人女性出卖了黑人，因为黑人女性在小说中书写了性属问题，损害了黑人男性的形象及尊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处理黑人女性与黑人男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黑人群体与白人群体之间的关系，成为黑人女性书写的新增主题。80年代以来，随着非裔美国女性文学的发展，黑人女性形成巨大的创作群体，在种族矛盾和性别矛盾激化的社会背景下，黑人女性开始从女性的视角，重新认识黑人群体、美国社会以及世界。在集体型叙述交流模式下，黑人女性小说家通过发出集体的声音而壮大了黑人女性的力量；同时，通过对各种不同群体故事的书写，黑人女性从自己的视角重新认识和书写这个世界；更为重要的是，黑人女性通过发出集体的声音，不仅建构了黑人女性群体主体性，同时还开始含纳男性声音。

“叙述者，是故事‘叙述声音’的源头。至今一个多世纪的叙事学发展，核心问题是小说叙述者的各种形态，以及叙述者与叙述的其他成分（作者、人物、故事、受述者、读者）之间的复杂关系”^①，而受述者的二次叙述则是故事意义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信息发送方与信息接收方的叙述交流产生文本的意义，而各种不同叙述交流模式各有不同特点，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叙述交流模式是不同文化群体在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下的不同选择，也是叙述交流双方的共同选择。叙述的有效性就在于创作者既不脱离各自所处时代和环境中的叙述常规和社会习俗，又能灵活采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和技巧来积

^①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叙述的符号学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2页。

极参与社会话语权威建构并获得读者的支持。

作者简介：

方小莉，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叙述学研究。